

恩格斯曾盛赞德国民间小说的文化功能,可以“使一个手工业者的作坊和一个疲惫不堪的学徒的寒伧的楼顶小屋,变成一个诗的世界和黄金的宫殿”。在现代小说普遍流行的质疑、批判与大面积的解构改变了传统小说的社会功能后,恩格斯所强调的情感美学动力显然是稀缺的。正是从这重意义上看,杨志军的长篇小说《雪山大地》关于生活的信心与美的建构力,无异于激活了文学古老的诗教传统,恢复了小说的道德与情感共同体的社会文化功能。

小说从父亲去藏区工作写起,将沁多草原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牧民生活史、边疆发展史以及汉藏共建家园的心灵史与情感史,在极具特色的边塞风貌和藏地语境中全景式展现,涉及雪域高原的生产建设、教育医疗、商业转型与自然生态等人类社会变迁中的各层组织。面对如此波澜壮阔的长时段历史,作者并没有将其处理成概念空泛的类型叙事,而是以具体的生活细节推动叙事,展开表意,解构出边疆及边疆人半个世纪的改革风貌。小说中的父母是草原的初代建设者,他们以外来者的身份认识建设藏区。外来者身份使他们获得了差异化的视野,能够感受藏民的观念、情感和心理,也能理解雪域高原的精神信仰与文化积习。这是改变藏区落后面貌的基础,也是改革中贯彻始终的观念难题。甚至可以说,《雪山大地》里的父辈们建学校、办医院、修路建城,是与藏地文化观念和藏族同胞的心理建设共同完成的。比如县长希望父亲能够换掉沁多公社的头人角巴,从改变公社领导人开始,彻底更新旧时的社会结构与生产建设方式。但已然深谙藏地生活逻辑的父亲,知道角巴在草原人民心中的影响力,“牧人对不服气的人理都不理,到时候牲畜交不上,奶子交不上,皮张交不上,你怎么办?骑着马去催?连人影都找不到,草原这么大,等你好不容易见了人,牲畜上山啦,奶子吃掉啦,皮张做成袍子啦。”短暂思考后,父亲还是决定依循藏区人民的心理逻辑,借助藏民自己的力量,完成藏区的改革。

事实上,当地人有着严格的道德律令,他们的思考和行动都依循于此。这里广袤的冰川草原不仅给牧民提供物质滋养,还是抚慰心灵和情感的精神信仰。赛毛看到父亲去追赶欺负桑杰的人,知道拦不住,便唱起了祈福歌,祈求雪山大地的庇佑;聋哑少年才让的母亲忧心雪山大地听不到才让的声音,就无法带给他神的福泽。雪山大地构成了藏地牧民的道德律令,他们以至真至诚的心灵供奉自然,敬畏天地。这也是外来的改革者与之共情的心理逻辑。即使是身份、价值或立场存在不同,但对信仰的尊重与美好生活的共同期待,构成了彼此间的情感共同体。“来到高原后,几乎所有工作都是从零开始,就算你想扎根,也得自己找地方挖坑浇水。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到处都是处女地,只要你为它做过一件事,它就会认你是它的人;而你的回应便是只要它为你提供过一夜的光亮、一冬的温暖、一餐的饱饭,你就会认它给你的是家,是整个故乡。”情感共同体结构里,是作者四十年真切的青藏高原生命体验,有来自父兄的历史经验,也有个人的成长记忆。

《雪山大地》延续了杨志军擅长的现实主义写法。尤其在现实主义不断分层,充满了革命性或批判性后,杨志军能够丰富现实主义的涵义,在面积的解构之外,自觉继承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为当代小说做真诚与良善的全面式建构,不仅表明了作者的创作理念,也回答了当代小说是否还有建构美好能力的疑问。而这种有益于世道人心的写法,在20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等人的“人间送小温”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是消失不见的。

人物的生活处在一个充满日期的时光空间内,这是巴尔扎克留给小说的遗产。那些奋斗了半个世纪的父兄一辈,留下的不只是改善的物质生活和丰盈的精神世界。正如“远去的不一定是必然会消失的,我们能看得见,无论有多远,无论在哪里,我们都能看得见”,半个世纪的情感共同体,模糊了外来者和本地人,每一个站在雪山大地的后来人,都沐浴在雪域高原的天光里,受到雪山大地的祈福和庇佑。那些将青春奉献给这里的建设者,值得树碑立传。这便是《雪山大地》的人文主义立场。小说对自然与生命的关切,对先辈宝贵的精神遗产,对未来的期待,既充满了历史自豪感,也有强烈的现实忧患意识。在人、自然与社会历史大势的复杂关系中,杨志军也在不断思辨,只是与那些选择批判与解构的作家相比,他最终选择了相信。这与杨志军纯良的秉性是一脉相通的。从小说敞开的结尾可以看出,作为历史见证者的杨志军,他站在雪山大地之巅,决定以温柔敦厚之心,向世间万物喊出一句“扎西德勒”。在这个动人的时刻,与其说再去质疑人类是否还有通往美好的愿望与能力,不如说他决定在行动及“行动的中止处”去亲自实践。这样充满“一次性生存”的文学写作,无疑既沟通了新中国社会主义文艺的流脉,也打开了新时代的文学画卷。

作者简介:赵坤,山东大学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岛市首批签约文艺评论家。



《雪山大地》的道德律与情感共同体

◇ 赵坤

电影《奥本海默》：趋利避害还是遵从内心？

◇ 张瑜

诺兰执导的《奥本海默》终于在影迷翘首以待中揭开面纱。这部改编自2005年普利策传记文学奖作品《美国的普罗米修斯:J.罗伯特·奥本海默的胜利与悲剧》的电影未映先热,无论影片主人公的人生故事,还是导演诺兰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或者是众多好莱坞影星的倾力加盟,都令其自带流量和话题。影片在北美首映后,影评人和观众空前一致地给出好评。

诺兰以叙事结构复杂、时间空间交错、剧情烧脑、概念前卫为影迷津津乐道,这些特点在《星际穿越》《盗梦空间》《信条》中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在这部继《敦刻尔克》之后的第二部取材现实的电影里,我们更多地看到形式和技巧如何为内容服务,看到诺兰怎样从学术、军事、政治三个剖面为观众解析奥本海默这个谜一样的男人:学术方面,他是物理学领域20世纪后爱因斯坦时代量子物理学派的中坚力量;军事方面,他成功主导曼哈顿计划,用两颗原子弹提前结束二次世界大战;政治方面,他长期被怀疑有美国共产党背景和“左倾”倾向,最终成为战后麦卡锡主义的牺牲品。鉴于影片故事时间跨度长,出场人物多,诺兰选择原子弹为坐标,以原子弹爆炸前、中、后来呈现奥本海默人生进程的多个阶段,看似无序穿插,却准确地描摹出主人公的生命轨迹。

诺兰一向不太愿意立场鲜明地输出自己的观点和判断,而是把思考空间留给观众。这就是为什么“不愿意好好讲故事”的诺兰在树立和保持自己风格的同时,依然拥有众多拥趸。然而在这部电影里,不论是对于奥本海默个人品格的评判,还是对核武器研发的态度,诺兰非常罕见地透过作品“发声”。例如,在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发起的显失公平且有意构陷的长达四周的忠诚度调查中,奥本海默已经焦头烂额,当被问及是否与一位“美共”成员长期保持朋友关系的质询时,即便给出肯定答案会给自己增加不利证据,并且辩护律师也用眼神示意,奥本海默还是诚实作答。作为美国原子弹研发工程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奥本海默绝不是迂腐书生,甚至对为什么只是一个少数人参与的秘密调查,而不是通过司法审判给他一个公开陈述和辩解的机会都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仍然不属于用谎言为自己争取利益。与这个细节对应的,是陷害奥本海默的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施特劳斯的关于“政治、权力、阴谋”的阐述,一张从平静到扭曲的脸,一段从平淡到急促的独白,再加上一个精心设计的圈套,令人印象深刻。如果忽视了前面一闪而过的“君子坦荡荡”,后面的“小人长戚戚”就不会产生相得益彰的效果,就会辜负诺兰追求细节到极致的用心。

二战末期,太平洋战局胶着,日军的负隅顽抗,让耗尽心力的美国下定决心,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也因此,奥本海默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影片中,奥本海默参加庆祝集会,人们齐声高呼他的名字,有节奏地踩着地板,一贯冷静孤傲的奥本海默被现场情绪感染,放言应该让纳粹和希特勒也尝尝核爆的威力。然而就在一瞬间,他仿佛看到了在核爆废墟上哭泣和挣扎的众生,刚刚还踌躇满志的脸,被“千百烈日当空争辉”的光芒照到惨白,一双圆睁的眼睛因恐惧而失神。

对于奥本海默来说,核弹爆炸的余波始终侵蚀着他的内心。奥本海默一生最高光的时刻、最伟大的成就,却是他后来最持久的痛苦的根源。观众看到奥本海默如何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为了拯救世界,两颗原子弹提前结束二战,但直接和间接导致二十多万人死亡。战争还是和平?挽救还是毁灭?死亡还是重生?也许,正如奥本海默的一位挚友所说:“这个问题,不该由你回答。”但作为原子弹研制计划的领导者,这的确是奥本海默要面对的问题,所以才有了战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与爱因斯坦的第二次对话。与第一次纯粹属于学术范畴的探讨不同,这一次是两位科学巨匠对科学伦理的探讨并达成一致。所以才有了他后来竭尽所能地在多个公共场合发表对核武器政策的见解,被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秘密调查,进而被剥夺安全许可。对于一个参与过最高机密项目的物理学家,被剥夺安全许可就意味着社会性死亡,否定了他此前所做的一切。

有消息说,拜登政府正式撤销了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剥夺奥本海默安全许可的决定,认为当时做出的决定是基于政治目的的打压和抹黑。这部电影的上映或许对这段历史冤案的平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距离1967年奥本海默离世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着实令人唏嘘。

可以说,电影《奥本海默》的诞生,是一位天才科学家与一位杰出艺术家良知同频共振的结果。

作者简介:张瑜,媒体特约评论员。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扫码关注
「文艺青島」